

◀ (上接 11 版)

鲁迅和冯承钧有据可查的交集是在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分为小说、戏曲、讲演三股，负责对小说、戏曲、讲演材料以及画报、影片等进行调查、审核、筛选、改良等工作，实质是一个受教育总长直接管理的官方文化机构，鲁迅及冯承钧都参与了这个机构前期的工作。鲁迅一度出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股长，于 1915 年 9 月 15 日下午主持召开小说股第一次会议，冯承钧即为会议指定的三名起草员之一，负责起草小说股的办事细则，而当日的鲁迅日记中仅有寥寥数语“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会”。

1929 年，冯承钧突患中风，不得不辞去教育部公职，家庭生活陷入困顿。在 1932 年至 1938 年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请他为长期编译，每月给予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原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 20 世纪 20 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宗旨是利用稳定的基金来源，投资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1930 年起由胡适负责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补助，使冯承钧能安心译著工作，而这段时间也是其学术的高产期，多部著名的蒙古史、中西交通史译著和个人学术专著出版于此期间。

冯承钧翻译的第一本史地书籍是沙畹原著的《中国之旅行家》，在这本出版于 1926 年的册子中，他写有序言《翻译之缘起及旨趣》，提及自己在巴黎求学时，结识了汉学家沙畹，得其赠送书籍数种，《中国之旅行家》即其中之一。初读这本小册子，冯承钧觉得内容一般，都是国内旧籍已有的记载；后再读之，发现其中一些考据材料，解决了自己一直



▲ 1915 年民国教育部全体职员合影，第一排右七为冯承钧，最后一排左三为鲁迅

◀ 向达，1936 年 5 月摄于伦敦

在苦苦探索的问题，就加以修订将此书译出。在这篇前言中冯承钧也提到自己因研究中国法制，为搜集材料不得不进而研究相关的民族历史及制度、文物及中外之交流，这也许就是他从法律研究转向史地研究的最初动力。

1937 年北平被日军占据以后，冯承钧因病滞留；1938 年中华教育基金会每月 200 元的生活资助中断，写作的稿费也得不到保证，生活靠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长子冯先恕维持，其译著多系口述而由先恕代笔而成。后来冯先恕参加地下抗日组织，遭日寇追捕，加之身患重病，于 1943 年猝然离世。长子的去世对于冯承钧无异于雪上加霜，家庭生活和学术写作都受到很大影响，不得不以抱病之躯再度出任教职。

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6 年 1 月 11 日日记，“子衡先生名承钧，战前中风，以故不能南下，赖中华基金会接济，从事译述。自珍珠港袭击，美对日宣战，接济中断，又一年始入伪

北大任教。……然以人伪北大之故，不与忠贞之列，政府馈赠皆不及，贫病交迫。余承乏第二班事，请其继续任教，已不能到校上课，学生皆就其居听讲……”此处提到因为冯承钧在伪北大任教，被北归学者苛责，归于摈弃不用之列，幸亏有郑天挺伸出援手，请他继续任教。此处第二班，指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不承认留在北平的伪北大，将其改组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其中第二（分）班即原伪北大文学院，郑天挺受命担任此班的班主任。郑天挺日记中也提到从学校借支公款给冯承钧治病的事。

在向达的《悼冯承钧先生》一文中，也提到在冯先恕去世后，冯家生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向达愤慨地写道：“而于老病无力，无可奈何，以致八年陷虏的学人，事先既不予爱护，事后又不予以救助，等到今日，落井下石。”又如竺可桢日记（1946 年 4 月 6 日）所记冯承钧事，“北平陷日伪后，基金会稿费中断，卅二年执教于伪北京大学。傅孟真之流多指摘，可谓苛矣”。傅先生对投敌的汉奸不予宽容可以理解，板子打到冯承钧身上确属苛责了。

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和冯承钧也颇有渊源，宿白 1939 年至 1944 年就在北平的北大历史系学习，本科毕业后在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冯承钧曾为宿白讲授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对他后来的专业方向影响很大。伪北大被解散后，宿白没有了去处，由冯承钧推荐去了北大图书馆工作，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的推荐下，又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兼职工作。

据翻译家杨宪益在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所记，他当时收到好友向达来信，信中说冯承钧先生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死后家里穷得连棺材也无钱购置，向达不得不四方求援募捐。杨宪益说：“我对冯承钧一直是很佩服。向达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很佩服的人。向达的信里发牢骚，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愈来愈穷，愈来愈倒霉了。说他（冯承钧）的儿子那时候很穷——他儿子就是文艺界很有名的冯牧——说他的丧事没有人帮忙。向达跟我募捐，我手头大概有个二百块钱，我就给他寄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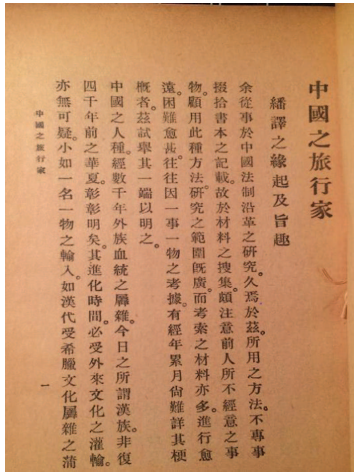
此募捐的发起人除向达先生外，还有吴晗、汤用彤、王重民、浦江清、白寿彝等当时知名学者，各方捐款都由陈垣先生代为转交给冯先生的遗孀和幼子。杨宪益此处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冯牧已于 1938 年奔赴延安，其实应正于军中担任新华社前线记者，幼子应为冯先铭。

冯承钧共有五子五女，本文提及的有其长子冯先恕（历史学者）、三子冯牧（原名冯先植，知名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五子冯先铭（陶瓷鉴定专家）。冯承钧的女婿陆峻岭（已于 2006 年去世）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中西交通史、元史方面亦有成就，曾参与校订数种其岳父的著作。例如《西域地名》本系冯承钧于 1930 年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编写的地名小辞典，1955 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后经陆峻岭整理于 1980 年再出版增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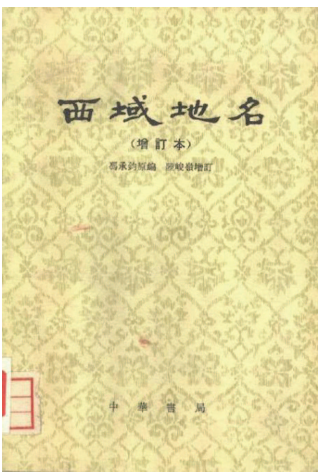
冯承钧中年之后遭遇坎坷，身体为严重的病痛所折磨，在艰难困苦中他依然笔耕

不辍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向达在为中华书局 1957 年出版的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所作序言中，很好地总结了冯承钧在中西交通史、元史、宗教史、考古学等领域的杰出成就，还有他在学术方面的勤勉、审慎。诚如向达所说：“近二三十年来孜孜不倦以个人的力量将法国近代汉学大家精深的研究，有系统地转法为汉，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近缘学，如西域、南海诸国古代的历史和地学，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启发者，还只有冯承钧先生！”冯承钧的主要精力都专注在翻译、校订国外学者的著作上，这是类似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很多研究者受益于他所翻译的高质量作品，至今他的各种译著和校订古籍不断再版，仍然被列为相关学科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冯承钧与向达、张星烺等几位先生一起作为开拓者，为中国学术界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译盛业、流美联辉”，语出《大唐西域记》第十二卷，被朱杰勤用在纪念冯承钧的文章中（1946 年新加坡《南洋学报》），形容其翻译成就算得恰如其分。学术翻译工作好比大树生长必须的枝繁叶茂，成就他人研究的开花结果，冯承钧本人的学术地位并不彰显，但对学术发展的贡献却是极大的，这样的学者值得我们敬仰和纪念，期待日后能有一本详细记载冯承钧生平和成就的传记问世。



《中国旅行家》之序言《翻译之缘起及旨趣》



冯承钧原著的《西域地名》，1980 年由陆峻岭校订再版